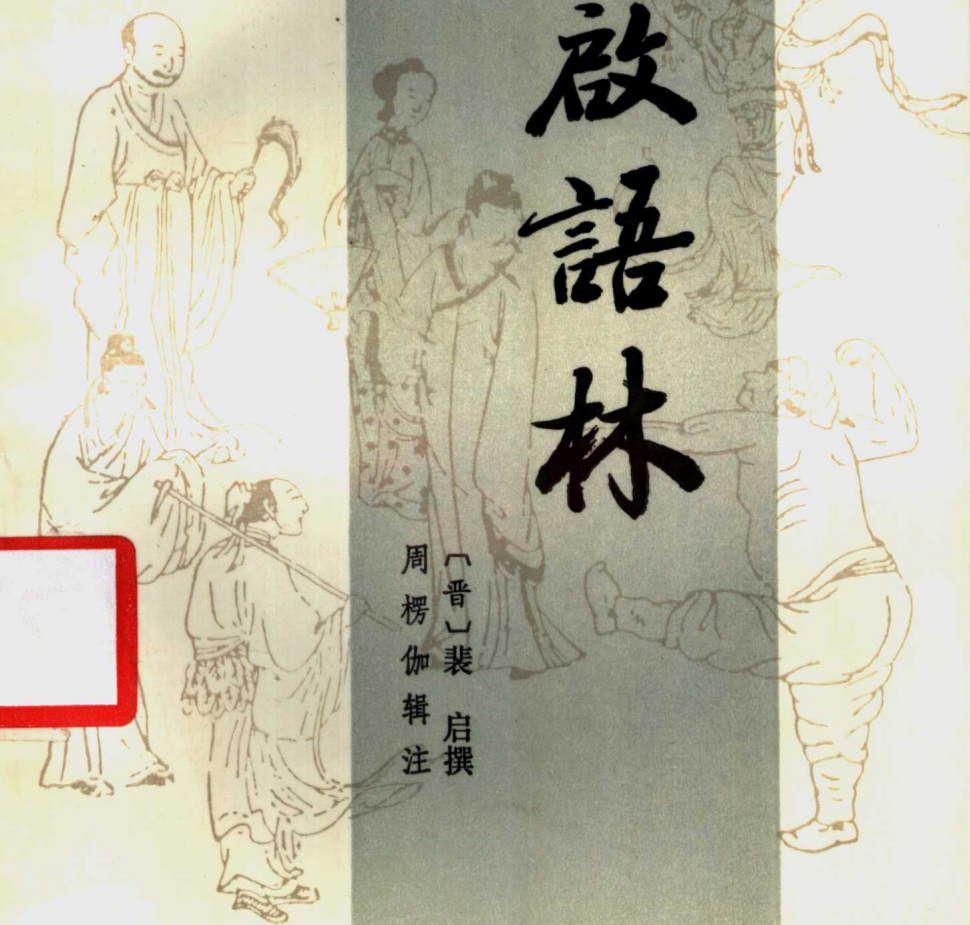


历代
笔记小说
丛书

裴啟語林

〔晋〕裴 啟撰
周楞伽輯注



历代笔记小说丛书

裴启语林

〔晋〕裴启撰
周楞伽辑注



历代笔记小说丛书编委会

主编：刘叶秋

编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宏钧 方南生 宁宗一

李文合 黄克 鲁德才

历代笔记小说丛书

裴启语林

〔晋〕裴启撰

周楞伽辑注

·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4.625 字数87,000 插页2

1988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8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2,600 册

ISBN 7-5039-0206-X/I·130

定价：2.00 元

出版说明

历代笔记,大致可分为小说故事类、历史琐闻类、考据辨证类三种。其中小说故事类,即笔记小说(文言短篇),这是我国古典小说的一个重要流派,继承神话传说的传统,并受诸子史传的影响而形成,由汉魏以迄明清,源远流长,代有佳作。这些小说,保存了许多民间传说和轶闻遗事,内容丰富,题材多样,不仅作为小说,自具特色,而且展现了较广泛的社会面,于各个历史阶段的政治状况、思想潮流、典章制度、民情风俗以及宗教信仰等,都有所反映,对研究文史哲,有多方面的参考价值。即一般历史琐闻类笔记和以考辨为主的笔记,也往往包括一些短篇故事,显示着小说与笔记的密不可分的关系。

笔记小说,是我国文化遗产中的一部分宝藏,值得认真发掘。有不少书,许久未曾印行,缺乏校点特别是加以注释的本子;有不少书,流传不广,未受重视。根据一九八一年九月中央关于我国古籍整理出版的指示精神,我们着手编辑出版这套《历代笔记小说丛书》,以具有高中以上文化水平的为读者对象,以普及为重点:①出全书的校注本;②出佚书的辑注本;③出优秀作品的选注本。为

文学艺术工作者及爱好者提供读物和研究资料。于汉魏六朝、唐、宋、金、元、明、清的笔记小说(包括少部分历史琐闻类及考据辨证类笔记)系统地分批出版。此外,还准备配合理论研究,撰写各个时期的笔记小说评论,编印专集,与作品相辅而行。

这样,就使各个时代的笔记小说,既能自成系统,而又各本单行。分合均便,出书先后,亦不须以时代为限。或通过原书,研究分析;或阅读选本,吸取精华;或总览各代代表作品,系统研读,自择所需,在于读者。

〈历代笔记小说丛书编委会〉

一九八六年六月

前 言

我国历史上的魏晋时代，不但是国内各民族大迁徙大流动大改组的时代，而且是一个丧乱频仍、法令严峻、人命朝不保夕的时代，士大夫为了免于杀身之祸，相率逃避现实，从事玄言清谈，《老》、《庄》、《周易》，成了枕中鸿宝，同时名教动摇，礼法败坏，过去定于一尊的儒家学说再也不能维系人心了，于是人人都以放任为达。有些人嗜酒荒放，披头散发；有些人去巾幘，脱衣服，裸体相对，说是得大道之本；有些人则作隐遁之计，入山惟恐不深，入林惟恐不密。正当大多数人精神空虚无所寄托之际，早在后汉时期就已传入中国的佛教，这时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佛家教义的四大皆空，和《庄》、《老》的玄言微旨，原是互为表里的，加之又有一辈高僧从西域来到中国，以他们渊博的学识、美妙的词令，宣扬佛教的精蕴，使人们空虚的精神又多了一种解脱和安慰的方法，这就是明知要在现实世界里超凡成仙或长生不死是无望的，而相率服

膺佛家的教义，去修度来世。另一方面名教虽然动摇，而崇尚实务、要求在政治上有所革新的也大有人在，尤其自后汉以来历久不衰的品评人物的风气，随着魏晋时期九品中正制度的确立，也在社会上扩大了势力。这许多因素汇合在一起，再加上这时期人的平均寿命又短，往往正当英年，猝告死亡，死者给生者带来了伤感，于是便在人们的精神世界亦即思想意识方面造成了复杂多样的奇观。

魏晋时期的学术空气，当然不如战国时期的浓厚，但思想的复杂和论辩之风的热烈，却也不亚于战国，各以己见提出自己的学说主张，排斥他人的主张见解，也和战国时期一样，但思想内容却大不相同，战国时期的学术思想虽然众多，究其实，几乎无不带一些纵横家气息，这因为创造这些学说的人，除少数具有出世思想的老子、庄子外，目的都在于求利禄，想使君主信从自己的学说主张，从而获致卿相的地位，是入世而不是出世。魏晋之交的思想界情况则恰好与之相反，是出世思想占了上风。这时的社会风气是推崇玄学，竞尚清谈，所谈内容，虽有《周易》、《庄》、《老》三者，要当以老子为主，或主无为，如夏侯玄作《自然论》，主张归真返朴，崇法自然；或主无名，如何晏之作《无名论》；有些人则在注释玄学的经典著作中，发挥自己的主张见解，如王弼的注释《周易》和《老子》，向秀、郭象的注释《庄子》。在这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片玄风之中，也有些积极入世的人反对这种崇尚玄虚的社会风气，主

张改革政治，培养人才，推行礼乐教化，如裴颢作《崇有论》，就是反对玄之又玄的无为思想，主张有为而治的。

自由放诞、蔑弃礼法的结果，徒然促短自己的生命。当时人的平均寿命本来已经很短，怎经得起嗜酒放达，滥服五石散等热性药物，戕贼身体？于是生命越来越短促。针对这种情况，有些有识之士如嵇康等，又发表《养生论》，以为人之所贵在乎生，神仙禀之自然，非积学所能得，至于导养得理，则安期、彭祖之伦可及，要求服养自然，把黄、老之学当做一种养生术来看待。这就引起崇尚虚玄的向秀的反对，作《难〈养生论〉》加以非难；嵇康又作《答〈难养生论〉》以驳之，这样一来，辩论的风气便愈演愈烈。然而可悲的是：不论贵生、养生，崇有、崇无，结果都在这个世乱如麻，政治形势苍黄翻覆，人命贱如草芥的时代，仍难免在严刑峻法下死于非命！有些人只是因为名高引人妒忌，就死于他自己根本没有想到的莫须有的罪名。

由于人命危浅，朝不保夕，加之先秦西汉所没有的佛家地狱轮回、十殿阎罗、因果报应等耸人听闻的迷信说教逐渐深入人心，于是神鬼怪异之谈也随之盛极一时，《列异传》、《博物志》、《搜神记》、《灵鬼志》、《甄异传》、《述异记》等志怪小说，就是这时期应运而生的产物。晋人好谈神鬼，甚至连篇累牍地写进史书，这也是当时科学思想没有萌芽，民智未开，视一切事物皆可成鬼怪的观念所造成。但内容情节大多雷同，如主张无鬼论的人遇鬼而卒；禁鬼神淫祀的人，鬼来与之谈理，不胜，鬼作色而去，人亦

随之而卒等等，都是事同人异，这也反映了当时这批志怪小说作者视野不广，认识力不足，想象力贫乏，因此只能互相因袭模仿，缺少新意。

二

正当人们厌倦于千篇一律的志怪小说时，有一位尚未入仕的青年裴启，忽然独创一格地送出了一部记录汉魏以来迄于当世知名人物言语应对之可称的志人小说《语林》。这就使世人耳目为之一新，大家热烈欢迎，时流年少，无不传写，各有一通，远近哄传，竟成一家之学的裴氏学。这也是无怪其然的。因为魏晋的清谈家即使祖述玄虚，也未尝不品评当世人物；至于注重现实政治的人，则更勤于实务，重视人才，体察人的才性，效法圣贤的嘉言懿行。裴启的这第一部志人小说，使时人从虚无缥缈的神鬼怪异境界回到现实的人世，所记的人物行事，言语应对，又都是可以称述的，既可以资为立身处世的楷模，又可以娱悦身心，资为谈助，所以它的一纸风行，竞相传写，人手一编，正是很自然的事。

裴启字荣期，河东闻喜人。因他没有做过官，是个处士，所以《晋书》不为他立传。他的《语林》初出，虽曾轰动一时，但因谢安的诋毁，其书不传，他的名声也逐渐为人们所遗忘。

《语林》在当时虽是创新的作品，但对过去也并非绝

无继承，它所继承的就是汉武帝令郡国察举孝廉以来，到汉末魏晋蔚为一时盛事的品评人物的社会风气。这种品评，不仅是对人的学问文章，就是容貌举止、言语谈吐、气量见识、性格行事，也无不包括在内。采集《语林》、《郭子》等书而成的《世说新语》，其中有许多门类就都和品评人物有关。品评人物主要着眼于人的才性，由于人的气质禀赋各不相同，表现出来的才能也随之各异，一般认为才能的美恶便是人物美恶的表现。魏刘劭的《人物志》，就是一部专论人物才性的书籍，以为人的一切都以性情为本，论人必须体察他的性情。曹丕《典论·论文》认为人的文章都和他的个性气质有关，如论孔融，说他“体气高妙”，论徐干，说他“时有齐气（舒缓之气）”；论刘桢，说他有“逸气，但未遒耳”。这简直认为“文章即人”，至少也是“文如其人”了。

后汉末年的党锢之祸，摧残了不少人才，但品评人物的社会风气并未因之稍杀。魏晋初期的统治者都崇尚法治，感觉过去评定人才的方法已不合时宜，必须有新的选拔人才的标准，于是关于人物才性的同、异、离、合，即所谓“四本论”的争辩，便成为魏晋之际清谈的另一重要主题。这和崇尚虚无的玄谈恰好相反，玄谈是超脱现实，远离政治，入于虚无缥缈之境，才性之谈则是崇尚实务，为现实的政治品评和选择人才，以实代虚，以有为代无为。《语林》便是在这种品评人物的社会风气下应运而生的产物。

三

可是这第一部志人小说《语林》出世不久，就受到了意外的打击，打击它的竟是当朝宰相谢安。裴启是怎样认识谢安的，没有文献可考。当时宰相的地位虽高，但也并非高不可攀，为了博取声誉，也经常提携奖掖后进。裴启既出自名门望族，自有和谢安往来的机缘，而且彼此似乎还相当亲热，曾同席饮宴，所以谢安才会批评他“乃可不恶，何得为复饮酒（你这人很好，为什么还要喝酒）？”而他也就把这话当做嘉言记入他的《语林》，另外还记录了谢安品题支道林的话：“如九方皋之相马，略其玄黄，取其骏逸。”这本来是没有什可以非议的，《语林》原是一本记录汉魏以来迄于当世言语应对之可称述的书，谢安这两件事虽都是小事，但也不无可称述的地方，裴启记入书中，不但于谢安无损，而且足以提高其声望。可是谢安不知出于何种心理，也许是妒忌《语林》享名太盛吧，当庾亮的小儿子庾道季向他提起《语林》称述的这两次言论时，谢安竟一概否认，说：“都无此二语，裴自为此辞耳。”但他赞美支道林的话不仅确有其事，而且知道的人很多，这因为支道林虽善谈禅，章句却时有遗漏，为注重文字的人所轻视，谢安独重之，比之为九方皋的相马。庾道季对此也略有所闻，“意甚不以为好”，因又向谢安推荐《语林》所载王珣（东亭）《经黄公酒垆下赋》，这一来就更触怒了谢安，原

来谢安和王珣素有嫌隙，王珣、王珉兄弟都是谢安家女婿，因猜疑致嫌，谢安气量褊狭，既绝珣婚，又离珉妻，由是王、谢二族遂成仇衅。庾道季不知就里，竟向谢安推荐他所深恶的王珣的作品，结果是碰了一鼻子灰，谢安读后，“都不下赏裁”，甚至迁怒裴启不该在《语林》里登载王珣这篇赋，责怪庾道季：“君乃复作裴氏学”。时人不察，以为谢安是堂堂宰相，所言决无虚诬，裴启却不过是个白衣处士，地位既低，年纪又轻，难保不弄虚作假，把他自己的话当做谢安说的话，尤其是“谢安谓裴郎乃可不恶……”一语，大有借重谢安的名望地位抬高美化自己的嫌疑，于是众咸鄙弃裴启的为人及其书，而《语林》遂废。其实倒是谢安赖掉自己所说的话，《语林》所载反是实录。世事悠悠，惟视人物地位高下而定是非，古今一辙。人们只知趋奉当朝宰相谢安，有谁来为白衣处士裴启平反雪冤呢。然而公道自在人心，一百二十年后，南齐檀鸾作《续晋阳秋》，在揭露谢安为他同乡推销蒲葵扇的丑闻以后，便引裴启的事作比，不胜感慨地评论说：“夫所好生羽毛，所恶成疮痍。谢相一言，挫成美于千载，及其所与，崇虚价于百金。上之爱憎与夺，可不慎哉！”

名公大臣固然一言九鼎，但也不见得便能“挫成美于千载”，扼杀众所欢迎的文艺作品。《语林》在遭受了这场打击以后，仍旧流传不衰，到梁时还存在，不过删去了记谢安语的两条而已。《世说·轻诋》篇谓：“今时有者，皆是先写，无复谢语。”此说似未足信，如是先写本，其中正应

有谢语，否则庾道季何以能举以诔谢安？只有遭了谢安诋毁后的传写本，才会加以删落，无复谢语。

四

《语林》因为是最早出现的志人小说，所以虽然遭受了谢安的打击，声价大落，却仍旧废而不废，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召集文人士编纂《世说新语》，就采袭了《语林》中的不少条目，梁刘孝标为《世说》作注时犹得见《语林》原书，引入注中作为对《世说》补充解释的地方也不在少数。臧荣绪、王隐、虞预、何法盛诸家所撰的《晋书》虽都已佚，但就现存的佚文对照，其中往往和《语林》所记载的相符，唐修《晋书》，以臧荣绪《晋书》为蓝本，同时兼采《语林》、《世说》、《搜神记》、《幽明录》，刘知几曾在《史通·杂说》篇中提到过。《隋书·经籍志》“小说家类”于《燕丹子》下注：《语林》十卷，东晋处士裴启撰，梁有，今亡。由于《隋书·经籍志》把《语林》列于《燕丹子》下，于是日本的《佐世见在书目》中就把《燕丹子》记为“晋处士裴启撰”（见日本青木正儿著《中国文学概说》）。其实这完全是出于猜测。《语林》所记人物言行，每条都不过十余字至百余字，象《燕丹子》那样长达数千字、人物描写几可与唐人传奇媲美的历史小说，决不会出自裴启手笔。

裴启《语林》虽然在隋代已经亡佚，但在唐宋类书如《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初学记》、《六帖》、《太平御览》、

《太平广记》、《续谈助》、《类说》、《事类赋注》中犹时见其遗文，刘孝标注《世说》也引用了一部分。不过这些类书和注释的引文都有一个普遍的缺点，就是或者迁就门类的要求，或者限于说明和补充正文，多半出于摘引，一鳞片爪，使人难以窥见原貌，有些甚至仅摘取数字，不列上下文，更使人如坠五里雾中。

尽管有这样的缺点，但如能把现存的佚文加以辑录，则纵使未能恢复原貌，毕竟慰情聊胜于无。最早从事这项工作，把散佚了的《语林》辑录起来的是鲁迅先生，时间是一九一〇年（见这年十一月十五日致许寿裳信），距今已七十多年了。他并不是专辑《语林》一种，而是和《古小说钩沉》中的数十种佚书同时辑录的。据说他当时夹在各种类书中的签条有六千余张之多，可见其用力之勤。不知是否因此书另有一名称叫《裴子》，或者因刘孝标注《世说》对作者的名字叫裴启还是叫裴荣分辨不清，所以把辑录的这书定名为《裴子语林》。

鲁迅为辑佚工作者创造了一种值得师法的典范，就是择善而从。由于每条佚文散见于多种不同的类书，文字并不完全一致，有些同一种类书前后援引文字也小有差异，这就不能专主一种本子，必须参照各种不同类书的引文互相比较，择其善者而从之。这样的方法也许会被别人讥为百衲本，然而这正是辑佚工作者必须遵循的原则，因为佚文在被各种类书所援引或摘引时，其文字往往已经过后人的窜改，如果专主一种本子，常不免夹带后人

所窜改的私货，只有参互比较，择善而从，才能接近或恢复原貌。对于仅从中摘引数语不列上下文，使人莫明所以的佚文，据《世说新语》补足，或取《世说》注引文与《世说》参综写定，也不失为一种好方法，因为《世说》中有许多条袭自《语林》，《语林》所佚失的文字，《世说》中往往还保存着全文。不过这方法也不完全可靠，因为《世说》的文字经后人改窜的地方更多，所以还须对照《晋书》和其他晋人所修史书的遗文，才不致有差忒。

鲁迅辑《裴子语林》，也有一些失误的地方，首先是他误引了《类林杂说》。此书是金王朋寿著，分门别类撰集汉魏以来人物轶事，其中颇多张冠李戴的错误，更非裴启《语林》原文，不知何故竟辑入《语林》书中。虽然所引条数不多，并且在每条末尾加小字按语“首末皆王朋寿语”，毕竟是不应该的。其次是各条所举人物言行除牵牵可考者时代大致不误外，其余人物时代颠倒错乱，不一而足。如戴叔鸾是后汉时人，却列于晋初王武子、孙子荆条后，辛恭靖即《晋书·忠义传》中的辛恭靖，司马太傅即会稽王司马道子，都是东晋末年安帝时人，却列于魏晋之际的何晏与夏侯玄之间。王太保是王祥，西晋初人，却列于东晋末年的谢安诸条之后。这些还是比较容易看出的错误，其他东晋人列于西晋人之上，西晋人居于东晋人之末的时代错乱，多得不胜枚举。显然，鲁迅当初只是撮录原始材料，并未经过排比整理，更没有经过仔细的校勘。由于他后来忙于写战斗性的杂文，无暇及此，所以当郑振铎编

《世界文库》，要求他把所辑录的这些古小说史料加以发表时，他始终没有答应。这充分表现他治学的谨严和对读者的负责精神。我们今天只应对他“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辑佚工作表示敬意，而不应对他网罗遗帙辛勤得来的原始材料有何非难，既然他生前都未及见他所辑录的《古小说钩沉》的出版，我们又岂能妄为评议？

五

其实早在鲁迅以前，清人马国翰在道光年间就已从事辑佚书的工作，他辑佚的范围远较鲁迅广泛，举凡宋以前的经史子部佚书，都在辑录之列，共辑得五百九十四种（一说六百二十九种），都是宋以前散佚的书后世久无传本的。书成，即以他的书斋玉函山房名其所辑佚书，分为经、史、子三编，其中经编所辑最多，比较完备，史、子两编数量既少，又舛乱无体例，好象也是未经整理编定的稿本。裴启《语林》也辑于子编小说家类，共二卷。由于当时信息不灵通，书又印得少，不容易见到，鲁迅生前可能并未见过这部《玉函山房辑佚书》，否则一定也象对吴兴嘉业堂丛书一样，千方百计要取来一读的。现在上海图书馆作为善本看待的《玉函山房辑佚书》，也是纸质粗糙的黄表芯纸本，经与鲁辑《裴子语林》对读参照，多出六条，其中有数条见于明何良俊撰集的《何氏语林》，显系鲁迅漏辑，故补注于卷末。鲁辑有几条文字有讹夺，人物也

无可考，有几条无人物事迹，甚或仅有三字、六字，与作为志人小说的《语林》体例不符，显非《语林》原文，而系类书误引或误题，但也未便摒而不录，故仅不加注释，仍附于卷末，是否《语林》文字，由读者去裁决。

裴启《语林》经马国翰、鲁迅二家先后辑佚，收集得已相当完备，是否还有未收的佚文呢？已故戴不凡先生在《小说见闻录》中列《语林》佚文二条，一条出明代慎懋官《华夷鸟兽续考》，经查，原来是唐赵璘《因话录》中的文字，并非《语林》佚文。另一条出明代钱世扬《古史谈苑》，经查，它的来源出处比《语林》还早，原来是魏邯郸淳《笑林》中的一条，鲁迅早已辑入《古小说钩沉》，更不是《语林》的佚文。其所以会导致这样的错误，是因明何良俊也把他所撰集的志人小说定名为《语林》，不加“何氏”字样以为区别（现在的古籍出版社影印的四库全书本也还是如此，书名径用《语林》，不加“何氏”），这就很容易和裴启《语林》相混淆。明人引《何氏语林》，直称《语林》，戴不凡先生不察，便误以为是裴启《语林》的佚文了。

那么《语林》是否就没有佚文了呢？这也不见得，我就见过两条未为马、鲁二家所辑的《语林》佚文，都出于《渊鉴类函》。一条见方术部医四，云：“人有患应病者，问医官苏澄，澄云：‘古无此方，吾检《本草》，集天下药物试读之。’每发一声，腹中无不应，惟至一药，再三无声，因处方以此药为主，别味性亦相近，服之，疾除。”一条见巧艺部射三，云：“宣宗幸苑中，回顾仗外舍，屋际有倚竹一竿，去御